

哈爾濱人物

第二輯

哈尔滨地方志史料丛书

哈 尔 滨 人 物

第 二 辑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编者的话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反映城市，必然要反映城市中从事各项活动、促进或阻碍城市发展的人，特别是城市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人物志是城市志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进一步探索志书中人物传的撰写方法，广泛征求各个方面对入志人物的意见，尽量避免志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疏漏和成书后的遗憾，继《哈尔滨人物》第一辑后，在反复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我们从所征集到的哈尔滨市各历史时期、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名单中，又筛选出49人，编辑成《哈尔滨人物》第二辑。本辑收录的人物，均为已故人物。其中以正面人物为主，亦收入部分反面人物；以人物在哈尔滨的业绩、影响为主要选择依据，不考虑其级别、籍贯；适当注意了历史时期及各方面人物的比例；人物次序以生年先后排列，同年以月份为序，外国籍人物置最末。

本辑人物的撰写，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虚美，不隐恶，对人物的评价力求客观准确，以获得较强的史料价值，为基层志办撰写人物提供借鉴，为编写《哈尔滨市志·人物志》奠定基础。由于工作的基础及水平的局限，愿望与实际之间肯定存在较大差距，恳切地希望领导、专家、修志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质量逐步提高。

1991年2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凤 翔	(1)
冯金封	(4)
侯 虚	(6)
蔡运升	(10)
熊成基	(13)
韩光甸	(16)
邓洁民	(20)
刘珮芝	(24)
周利惠	(27)
韩铁声	(31)
才镜石	(35)
张锡财	(39)
任国桢	(43)
张柏岩	(47)
吴镇东	(51)
吴丽实	(54)
吉万山	(58)
张有仁	(61)
赵一曼	(65)
冯仲云	(69)
金剑啸	(72)

李兆麟	(77)
张津民	(81)
何延川	(84)
姜椿芳	(88)
侯小古	(92)
孙桂云	(96)
邹问轩	(99)
符保卢	(104)
赵志萱	(107)
任志林	(111)
邹树春	(114)
倪金德	(118)
罗明哲	(121)
朱怀进	(125)
温长淮	(129)
王一丁	(133)
丁凤莲	(136)
霍尔瓦特	(139)
石井四郎	(143)

凤 翔

凤翔（1840——1900），汉军镶黄旗人。初任笔帖式，累次升迁兰翎骁骑校、镶红旗汉军佐领、五常堡协领、吉林协领、吉林鸟枪营统辖参领。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2日，清政府令所有吉林、黑龙江两省练军调集盛京（今辽宁）备用。当时，凤翔任吉林鸟枪营统辖参领，立即随吉林将军长顺开赴盛京。长顺受命节制前线各军，凤翔负责全军的粮秣辎重供应。在辽阳战守问题上，长顺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意见不合，凤翔从大局出发，在二人之间作调解，并使全军“给食不乏”，深得两帅的赞许，对清军取得辽阳保卫战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光绪二十一年一月（1895年），依克唐阿署理吉林将军，凤翔直接归依克唐阿统辖。五月，中日签订议和条约，双方停战。凤翔在战后受到朝廷嘉奖，加副都统衔任打牲乌拉协领。凤翔在乌拉协领任内，因剿办“土匪”有功，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晋升为记名副都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阿勒楚喀副都统噶噜岱开缺进京，“以记名副都统凤翔，为阿勒楚喀副都统。”阿勒楚喀（今阿城），是东北地区的咽喉。按照清朝惯例，新任副都统应进京陛见皇帝，因阿勒楚喀边防紧要，“著准其暂缓陛见，迅即赴任。”凤翔到任后，吸取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注重边防建设，积极筹措款项，购置军械，训练防军，刻意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所统辖的军队面目一新。8月，

清政府“以吉林办理边防出力，赏阿勒楚喀副都统凤翔，头品顶戴。”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1899年)，清政府命前吉林将军长顺仍为吉林将军。长顺复任后，派凤翔去珲春帮办督理边务。珲春地连俄国和朝鲜，东南紧接摩罗崴(即波谢特湾)、海参崴各海口岸，稍南与朝鲜的钟城各府县隔江相对，是吉林省东南紧要门户。“设有专阃大员，经理地方词讼钱粮，兼办交涉事件。至沿边卡伦，则以佐防校等官，分司缉盗，禁私各事，一切布置已周且密。近又设立靖边防军，驻扎要隘，无非慎固封守之意。”不久，凤翔又回到阿勒楚喀副统都任内。12月“黑龙江将军恩泽因病出缺，以黑龙江副都统寿山，暂理黑龙江将军。”寿山调任署黑龙江将军后，荐举凤翔统辖镇边新军。寿山和凤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同在军前效力，所见所识极为相近。12月底，清政府“调阿勒楚喀副都统凤翔为黑龙江副都统。以镶黄旗护军统领钮楞额为阿勒楚喀副都统。”凤翔与钮楞额接交后立赴瑷珲就任。瑷珲自十七世纪中期始终是反抗沙俄侵略扩张的前哨，是黑龙江省北方大门。当时，黑龙江省有镇边新军十八营，防军十八营。寿山从这三十六营中拨出十五营交给凤翔统帅，加上瑷珲水师营，共计七千余人。凤翔自任副都统到沙俄发动侵华战争仅在职半年时间，其时正是沙俄制造事端、蓄意挑起侵华之战的时期。7月，沙俄为寻找出兵中国东北的借口，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首先制造了“米哈尔伊号”事件。为防止沙俄武装入侵，寿山命凤翔兼北路翼长：“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

沙俄在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于8月1日深夜，又发动大规模进攻，首先侵占了大黑河

屯。8月4日，俄军进攻瑷珲城。凤翔一面向省告急，一面指挥军民进行抵抗。他们坚守每一个建筑物，迫使俄军不得不“逐屋战斗”，每占一间房屋，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连沙俄《阿穆尔报》主编基尔赫涅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死守着炮架，直到阵亡”，“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表现得不愧为真正的英雄”。俄军受阻，凤翔组织军民从西门向大岭方向撤退。他步步设防，节节抵抗，推迟了俄军的进攻速度。凤翔率部先退至北二龙，继而进至匡安岭，最后退至北大岭，并在此设下埋伏。8月13日，俄军先遣队进入伏击圈，清军枪炮齐发，俄军被迫后退，又遭到埋伏在附近的500名鄂伦春骑兵的截击，打得俄军抱头鼠窜。凤翔亲临前线指挥，在枪林弹雨中往来冲杀。左腿右臂均受伤，曾三次坠马，“辄复跃上，鏖战不少休”。终因流血过多，又呕血“数升”，壮烈殉国。

凤翔殉国后，清政府为了讨好沙俄侵略者，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宣布爱国者有罪：“以黑龙江副都统凤翔……著发往极边充当苦差”。8月，清政府又说：“……黑龙江副都统凤祥（按“祥”应为“翔”之讹），业经发往极边，著加永不释回。”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吉林将军长顺等人又奏：“黑龙江副都统凤翔，临阵受伤，因病出缺，身后被诬科罪，请将罪名饬即查销议恤，以慰忠慰。”清政府却一拖再拖，“从缓置议”，致使这位民族英雄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韩来兴）

冯金封

冯金封（1869～1948年），汉族，同治八年（1869年）10月27日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一个读书世家。自幼聪明，勤学好读，深得家人、邻里和师长的喜爱。11岁时就能写诗作画，20岁中举，为官七品蓝翎，奉调于吉林省钱局任职。

冯金封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为官清正廉洁，对当时清政府的舞弊腐败，深恶痛绝。他虽身居官场，却久有弃官为民的心愿。当时在他结识的好友中，有位著名中医王老先生，彼此交往密切，感情很深，在王先生的影响之下，冯金封决定弃官从医，以医济人。于是他拜王老先生为师，苦读医学著作，认真钻研医术，他先后攻读了《医宗金鉴》、《寿世宝元》及《雷公炮制》等中医专著，在王老先生教导下，经过二三年的时间便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中医外科的治疗技术。至此，冯金封毅然辞官返乡，走上从医的道路。他在家乡昌黎县党家庄一边教书一边行医，颇受当地乡亲们的欢迎。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冯金封携眷来哈行医，初来时住在道里外国八道街（即端街）。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迁到道外南极街7号，迄今60余年，这里一直是冯家行医诊所和家属的居住老宅，现已延续到冯金封的曾孙冯铁。

冯金封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采众家之长，终于研制成独具一格的“冯金封膏药”，推出了“平和解凝膏（膏药）”及一系列外治、内治法和各种药物，医治了许多疑难病症。加之冯金封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关心患者疾苦，因而深受

患者的信任。冯金封中医外科专治毒蛇咬伤中毒及“腰痛”、“搭背”、“疗毒”、恶疮等症。他治疗蛇咬伤中毒，主要是外敷“解毒膏”和内服“护心散”，他根据蛇咬伤中毒的一般症状为：红肿热痛，伤口渗水，甚至神昏乱语的表现，而采用白芷、雄黄、蜈蚣、樟脑等磨制成膏外敷于伤口，疗效显著；同时采用绿豆粉、乳香、朱砂、甘草等研成粉末，早晚冲服，收到护心解毒、防毒内攻的疗效。当时冯金封治蛇咬伤中毒很有盛名。治疗“腰痛”、“搭背”、“疗毒”、恶疮等症，主要采取消散法，在消散病毒过程中，强调内外同治，也就是既治表也治本，内消外散，因病用药。冯金封采用的内服药是紫元丹，外敷药是解凝膏。解凝膏这种膏药是冯金封治疗外科恶疮等症的法宝，是临床中常用的药品，其效能广泛，阴症阳症都可以应用。

冯金封炮制膏药的主要原料是樟丹，它有拔毒生肌的作用。另外草乌、连召、白蔹、皂角、红花等药则相需为用，与紫元丹共同消散病毒，疗效极佳。冯金封炮制膏药的特点是把药物浸入油中煎熬，并用樟丹经高温后凝结而成，疗效很好。他的膏药不用火烤，不用水温，轻拈即可敷用，使用方便。

冯金封的膏药有“治里症”和“治表症”的区别，其“治里症”的风湿膏药能够透达腠理（中医指皮肤的纹理和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用粘韧性闭塞其气，将药力从毛细孔透入腠理，收到通经活络的疗效。所以贴“治里症”膏药有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活血化淤，消肿止痛的功能，也可以说是理疗，有改善血液循环的特殊疗效。其“治表症”之类的治痈、疽、疮、疡膏药更具有消肿止痛，活血化淤，止痛杀菌，祛腐拔毒，生肌敛口的功效。另外“治表症”膏药应

范围广，疮疡初起、已成或溃后各个阶段均可应用，具有很多通性的优点。

冯金封在行医中很注重医德医风，对于就诊的贫苦患者，经常是少收费或是不收费。1932年哈尔滨遭特大水灾，他除了带头捐款救济灾民外，又免费施诊，为灾民治病。冯金封非常热心慈善事业，是哈尔滨市有名的慈善团体大成祥的主要创立人之一。也正是由于其主要创立人冯金封是医生，所以义务施诊便成为这个慈善团体的主要慈善内容，成为远近闻名的施诊所。

冯金封于1948年10月17日于哈尔滨病故，终年79岁。

冯金封的第二代传人冯庆文，第三代传人冯开善及第四代传人冯铁、冯晓刚都能继承家学，从而使冯金封所创制膏药得以流传。

（李春阳、徐宝贵）

倓 虚

倓虚（1874——1963），俗名王福庭。原籍河北省宁河县北塘庄人。11岁入乡塾读“四书”。14岁时辍学学习经商。17岁时成婚，生有五男一女。19岁在沈阳经商时，正逢甲午战争，因时局不稳返回故乡。这时其父亲已去世。1898年，其母病故。为养家，他曾参加清军。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倓虚辗转兵火之中，逃到了营口，先是摆“卦摊”、学医，后开设了东济生堂药铺并进入佛教宣讲堂。

受海城牛头山性亮和尚指点，他开始学习《楞严经》。经潜心钻研，于1914年创著了非完全佛教思想内容的《阴阳妙常说》并在上海出版发行。是年到北京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听宝一和尚讲经，遂萌生出家之念，但未能如愿。

1917，43岁的倓虚立志出家为僧之念日益坚定。他独自离家到天津，由天津清修院清池和尚介绍，礼涞县高明寺纯魁和尚为其落发染衣出家，法名“隆衡”，号“倓虚”。后又赴浙江观宗寺受具足戒并留在观宗寺习禅。深得观宗寺住持、天台宗法卷持有人谛闲和尚的重视、教益。

1918年，他随谛闲到北京讲经，次年到天津任法修院代理主持院内事务。1920年，倓虚回到营口。由于他的说教，夫人王氏皈依了佛门，开始吃斋念佛；两子出家为僧。1921年，他到井陉县讲经，随后任沈阳万寿寺僧学主讲之职。此时，他主持创建了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重新兴建了沈阳般若寺。

1923年，倓虚应邀来哈尔滨市主持极乐寺的修建。

20年代早期，哈尔滨市没有一座像样的佛教寺庙。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外国人大量涌入哈埠。接踵而来的是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流行，一批教堂先后建立。南岗大直街一带洋教堂形成了“三点一线”的格局。当时传说南岗是潜伏在松花江南岸的一条巨龙，是哈尔滨市的“风脉”所在。哈尔滨市的中国居民认为：洋教堂在南岗相继兴建，是对南岗巨龙的斩腰镇首，它不仅败坏了哈尔滨的风水，还压抑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于是，以中东铁路稽查局长陈正青为首的一些虔诚的佛教信徒，四处游说，筹资建庙。他们的这个倡议得到了段祺瑞的秘书马冀平和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地方长官朱子桥的赞同、支持。极乐寺在倓虚的主

持下于1924年农历9月29日竣工。建成后的极乐寺宏伟壮观，抱住了“龙头”，压住了“龙尾”，保住了哈尔滨的“风水”，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极乐寺建成后，倓虚任首任方丈。在任方丈的6年中，他多次登坛讲经并主持大型法会，在哈尔滨的佛教界享有崇高威信。

1925年，谛闲和尚付倓虚以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同年倓虚赴北京柏林寺讲经，任西直门内南小街弥勒院住持并创设佛学院。后东渡日本参加“东亚佛教联合会”。1928年，继任北京法源寺住持。翌年，陪同谛闲、清池等来哈尔滨举行大法会传戒，后退座。1931年，被请到西安传戒、讲经，任大兴善寺住持，设佛学院。次年7月，应善男信女之邀，赴青岛主持修建湛山寺。1934年始，倓虚任湛山寺首任方丈10年。1942年倓虚重新兴建了天津大悲院。

1947年，倓虚被邀到长春般若寺传戒，翌年到沈阳，转道去青岛。在长春传戒时，倓虚起草了一份《天台宗总山章程》。并准备将青岛湛山寺立为“天台宗总山”来管理天台宗各寺事宜，未能实现。1949年，倓虚应香港佛教界之邀到香港，住锡铨湾弘法精舍，陆续创建了“华南佛学院、佛教印经处、图书馆、天台精舍、弘法佛堂、青山极乐寺”等。

1963年6月22日下午2时许，倓虚圆寂，世寿89。其弟子于同年8月12日在香港九龙西贡山之麓，建舍利塔以示纪念。

倓虚中年出家，佩天台宗法印，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代传人，生平执志以宣讲佛经，弘扬佛法，营建寺庙和培养僧林为主。他号召“挽转世风宏佛化，竟将东土现西方。”极乐寺修建筑工程尚未完成之际，在倓虚的努力下，于道外三道街办起了一个“义学性质的佛教学校”。首期招生20多人，由

倓虚主讲《楞严经》。待极乐寺所有房舍殿宇完全修好，“佛教学校”迁到了庙中。之后，由于极乐寺的名声日益渐大，义学性质的“佛教学校”正式办成了“哈尔滨极乐寺佛学院”，招收出家的青年，“造就宏法人材”。在前后30年中，他讲《心经》64遍，《金刚经》42遍，《弥陀经》24遍，《楞严经》13遍，其它经各数遍不等；主要著述有《金刚经讲义》、《金刚经亲闻记》、《心经讲录》、《心经义疏》、《心经讲义》、《心经亲闻记》、《楞严经妙玄要旨》、《普贤行愿品随闻记》、《普门品讲录》、《大乘起信论讲义》、《天台传佛心印记注释要》等。倓虚谦虚地说：“我所写的东西，并算不上什么著作，只是补前人之所缺，述古人之余意。或有隐晦的地方，把它说明显一点，支离的地方，说得圆融一点”。他一生营建十方丛林9处，宏法支院17处，佛学院13处。直接受其甄陶或蒙其影响而皈依佛门者，达数百万人之众并使天台宗在我国北方得以“弘扬”。

倓虚为人平易，谦虚。他出家四十年，在极乐寺任方丈6年，在湛山寺任方丈10年，也经过其它好多地方，但他总是坚持“不别重食，不单受人供养，一切都随大众”。自己一个钱也不存，单夹衣只要能替换，多一件也不要。

其弟子大光以其生平的《影尘回忆录》及《示寂记》辑为《湛山大师法汇》，编入《中华续藏经》。

(杨 诚)

蔡运升

蔡运升(1879——1959)，字品山，黑龙江省双城人。早年毕业于保定法政学堂，后到浙江巡抚衙门任文案委员。1911年回双城，被推举为中学校长、地方议会议长。不久，应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之邀，任黑龙江都督府参事兼筹防处参议。因筹防出力，凡经升迁，1915年任黑龙江政务厅长。不久转任吉林省永衡官银号总办兼实业厅长、吉长道尹兼长岭交涉员、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居家于哈尔滨。

1929年春，中苏双方因中东铁路正副局长权限等问题争议甚烈，蔡运升曾会同苏联总领事参预调停并略见成效。5月间，由于哈尔滨地方当局搜查领事馆事件，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照会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致使中苏关系恶化。蔡运升认为“如中苏失和，某国必趁火打劫，与中苏均有不利。”为此，他通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梅尼科夫，愿照以前中苏两国商定的关于处理中东铁路的办法进行调停，梅尼科夫也表示同意。随后，蔡运升往返于奉天(沈阳)、满洲里、哈尔滨之间办理交涉事宜。由于中苏双方对中东铁路管理权即正局长人事上互不让步，致使交涉无望。

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事件”爆发。其后，中苏战事不断，中方全线失利。蔡运升听说满洲里梁忠甲司令失利，札兰诺尔韩兄弟旅长阵亡有感，诗发“无端塞上起风云，消息传来不忍闻，一死一生都壮烈，龙沙争说两将军”。值此，张学良急电蔡运升到奉，派其与苏议和。11月下旬至

12月初，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乌苏里斯克）谈判数日，拟定在伯力正式开会商议，最后再在莫斯科开会议定。经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蔡运升被派为伯力会议中国代表。12月11日，他乘专车赴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与苏方会谈。12月22日，蔡运升代表中华民国与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又称“和平议定书”）。次日，中苏双方撤兵，两国战事停止。是时，蔡运升赋诗一首表心境：“昨朝坛坫结新盟，今日沙场已罢兵。万里风云重奠定，是非当付国人评”。1940年蔡运升就中东路事件的交涉经过写有《伯力交涉始末》一文。

中东路事件之后，蔡运升被委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蔡曾坐观形势。伪满洲国期间，蔡运升先后担任伪间岛省省长、中央银行副总裁、外务局长官、经济部大臣、参议府参议。1944年伪满通信社编纂的《大满洲帝国年鉴》中，对蔡运升在伪满的主要“功绩”这样记载：“康德五年（1938年）外务局长官任内，发扬外交使命，进行波兰、匈牙利、立陶宛、中华民国之友好承认关系，同五年六月，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及华北临时政府交换通商代表，实现满华关系调整之第一步工作，同七年任经济部大臣，对国家重要财源之确立及产业开发，更树有异常之实绩。”蔡运升在回忆伪满任职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耻辱的一段。东北解放时，他受苏方示意，离开长春赴北平。

1948年冬至1949年春，蔡运升住在北平的好友马占山家里。此时，他曾介绍过去一同办理中俄交涉事务的老友王之相（时任华北文法学院俄国语文学系教授）与马占山相识。王之相同许多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接触，在北平

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的情况下，他了解到中共的方针政策是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因此愿尽个人力量进行和平解放活动。王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蔡运升，加之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蔡运升积极介绍王之相与马占山相识。王对蔡运升、马占山说：“中共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人力物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一项重大决策……不论何人，只要转变立场，走向革命，都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前途是光明的。马占山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马占山与傅作义有金兰之谊，北平能否和平解放，取决于傅作义将军的最后抉择。蔡运升奔走于王、马之间，转达傅作义的态度，并与他们共同筹议推动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蔡运升与王之相在邓宝珊家中和傅作义会面，傅作义说：“王教授和蔡交涉员都是办理外交事务很有经验的，我们都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蔡运升对此段写有《我和马占山先生与北京和平解放的关系》（1951年）、《论解放北京的几个人》（1954年）等回忆文章。

五十年代，蔡运升曾先后任职于中央文史馆、北京文史馆。在北京一直寄居老友家中。1959年12月病逝。

（郭素美）